

繁花中国打工妹实录

一个庞大纷繁的特殊群体，一片生生不息的绚烂花海
她们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托起中国经济的龙骨
她们伴随改革、引发思索，带来针锋相对的议论

CCTV 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组 编著



半天天

繁花中国打工妹实录

CCTV 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组 编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繁花: 中国打工妹实录/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组编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 - 7 - 5017 - 9575 - 8

I. 繁… II. 半…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9458 号

责任编辑 刘艳

责任印制 常毅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3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7 - 9575 - 8/C · 26

定 价 32.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 - 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 - 68359418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68344225 88386794

张越·序

怒放的生命

在《繁花》第二集“天空”中,有个叫谢雪冰的农村妇女,住在福建的山里,我采访她是在四年前。闲聊时,我曾问她:“你们这儿电视信号好吗?能收到几个频道?”她说:“其实也不需要太多频道,大部分节目我都不敢看。”我当时很吃惊,以为自己听错了:“不敢看?”她又肯定地说:“就是不敢看,看了心里难过,除了×节目、×节目之外,很多都不敢看,尤其是×频道,就更不敢看,看看人家活成什么样子?看看我们自己活得多失败?心里头真自卑!觉得自己不配活着。”这段话让我难过很久,至今回忆起来依然很不舒服。我当时就回忆起小时候的一件事,小时候我家有两个邻居,一家过得很富裕,一家由于插队、两地分居等原因过得很穷。有一天富家的阿姨把穷家的阿姨叫到家里聊天儿,讲她家的日子过得怎么好,又拿出许多漂亮衣服铺排给人看,甚至从抽屉里拿出一叠钱来数,穷的阿姨扭头就跑出去,哭了很长时间,见人就讲:“我活着有什么意思?”我当时很生那个富阿姨的气,觉得她太伤人,太不懂事儿,我也有点儿生那个穷阿姨的气,觉得她也无聊,干吗要眼红别人的几件衣服、几个钱?那时我还不理解人生的挫败感与几件衣服几个钱之间的关系,总之,我同时失去了对两位阿姨的尊敬,就是说这件小事儿至少在我们三个人之间引发了一些不和谐的情绪。

如果我企图用富阿姨和穷阿姨的故事来说明媒体与谢雪冰之间的问题是不行的,因为后者显然要复杂很多。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的社会文化也日益“市场化”,呈现出强烈的“丛林法则”的痕迹:崇尚成功典型,相信强人逻辑,我们的理论根据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且不说这一理论在物种学领域尚有很大争议,现在我们直接把它挪移到社会伦理领域,便成为一场巨大的人性灾难。因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说得通俗点就叫“胜者为

王,打死活该”。世界不仅成为赛场,还成为战场。每个人都想做最后的胜出者,于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务必将他人甩在背后,甚至踩在脚下。成功者的秀场锣鼓喧天,失败者的呻吟无人理睬。问题在于成功者不仅是少数,从生命的意义上说,最后的成功者根本就不存在,而被忽视的也不仅仅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我们全体,全体的最真实的生命感受。媒体在这样的文化态度中,也表现出自己的短视与功利,就拿女性来说,看看招展于杂志、电视上的女性榜样,哪个不是集权力、金钱、智慧、美貌、品味、爱情于一身的成功者?她们潇洒地、游刃有余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令艰难时世中的众人倍感自卑、自怨,乃至愤愤不平,然后怀着对成功者的艳羡,投身人生的战场,将世界变得更加不堪。

当然,媒体也常报道谢雪冰这一类人的故事: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的不可思议的戏剧性冲突、惨、眼泪、争执、怨恨、爱心什么的,常见于各地电视台的人间传奇类、家事纠纷类的节目,据说收视率颇高。但我不认为这会给谢雪冰们带来真正的安慰,因为这一类节目在价值观的本质上与炫耀成功的“秀场类节目”没有任何区别,同样的成败逻辑、同样的功利态度,对他人苦难的赏玩儿与猎奇,充其量是居高临下事不关己的一点点廉价同情,到头来只有惨剧没有悲剧,只有闹剧没有喜剧。格调不高也是当然,本来站得就很低。

活在世上,最让人难过的是被轻视、被排斥,并因此导致的自我失败感,而不是衣服少一些,吃得差一些;最让人舒心的是被在意、被尊重、被爱的感受,而不是钱更多一些、房子更大一些。穷人富人的人生都有缺欠,对此我们当心存不安;穷人富人的人生都有光芒,对此我们当心存尊敬。尽管你不爱看言情小说,也应当记得简·爱说过的那句话:“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记住她没有说我们应当一样成功、一样有钱、一样健康或一样长得帅,她是说“灵魂平等”。

所以我愿意做那样的节目:把所有的人,不管是穷人、富人,丑人、美人,风口浪尖的人、偏僻角落里的人都当成“人”来看待的节目,听生命感受,看人世沧桑,倾听、了解、接纳、在意……

说回打工妹问题,为什么这个群体我们必须关注?

从经济上说,30年来打工妹群体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我们无论如何都统计不出,这么多年来,在外打工的女孩们总计往家乡寄过多少钱。在

片中我们曾以四川的一个镇为例作了一些推算,发现数目惊人,可以看到的是城市在扩大,高楼在崛起,“中国制造”的产品行销全世界,这一切都是打工仔、打工妹们的劳动换来的,所以,深圳,这个凭空出现的壮丽新城,在纪念城市的建立时,也曾为打工妹塑像致敬。与此同时,打工妹们月月将自己的血汗钱寄回家中,哥哥娶了媳妇,弟弟有了学费,父母盖了新房,一个个村庄脱贫了,一个个乡镇繁荣了。

从文化上看,打工妹群体也是个奇观,她们从传统到现代,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生产、宗族社会到都市生活、职业女性,她们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走完了前辈女人几百年、上千年走过的路,这个群体的全面、快速的转型,个中的撕裂与经验,非常值得研究。

从个体生命意义上说,在这个快速改变的过程中,每个人的悲与喜、得与失、血泪与欢笑,都值得社会的尊重。说到尊重,我常常想起一个日本电影——《望乡》,一个极度贫瘠、资源又匮乏的国家,当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会时,不得不拼出了全部的力量,而其中成本最低、使用最方便、见效最快的就是女人的身体,于是一家又一家献出了自己的女儿,女孩们被卖到东南亚,然后,把自己用皮肉换来的外汇一笔一笔寄回老家。家庭、家乡、家园因此脱贫了,多年之后,国家发达了,家庭中产了,家人体面了,此时,大家都不再承认那个粗俗、衰老、卑贱的卖淫女原本是自己家的姑娘。牺牲了一生的女人终被抛弃,一段历史亦被遮蔽,又过了很多年,当这段历史重现人间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早已羞辱过自己的母亲,出卖过自己的女儿,背叛过自己的姐妹……这也许是个并不恰当的联想,毕竟我们的打工妹从事的职业、赢得的收获、获得的肯定都不能与这个故事相提并论,我只想以此提醒自己,尊重生命才能尊重历史。

《半边天》是女性节目,对于一个巨大的女性群体的关注是它的职责所在,就我这个主持人个人来说,亦将我的心愿作以上告白。

张越

2009. 12. 17

繁花 | 目录

——中国打工妹实录

张越·序 / 1

一、小鸟 / 1

这是一个关于两代打工妹的青春故事。第一代打工妹背井离乡,开创了人生的新天地。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更多的人从广袤的乡村走出来,外出打工不仅为谋生,更为追求一种自由和热情。

二、天空 / 14

打工妹来到城市有了新的梦想,但梦想和现实、实现与破碎、憧憬和迷茫之间又有着种种的矛盾和冲突。

三、生命(上) / 24

生命是平等的,但是当生命遇到危险时,打工妹的泪水让我看到生命权的不平等,她们维护生命的权利被一次次地漠视。

四、生命(下) / 35

一幕幕的悲剧在不停地上演,令我们禁不住大声叩问:究竟是谁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把灾难降临到人间?最终的受害者究竟是一部分人,还是我们整个社会?

五、网 / 46

社会是一张由人组成的大网,亲情、乡情、友情就是这张网上连接每个结点的线。互为依赖、互为寄托除了是一种人际关系组成方式,更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实现方式。

六、争吵（上） /57

劳资纠纷是经济世界永恒的话题,劳动力的价值有时似乎比情感还难以称量。“血汗工厂”导演世界劳工运动,如果没有政策和制度的进步,劳动者的权益升级或许只能是一个“乌托邦”。

七、争吵（下） /68

自工会制度建立以来,千千万万的劳动者找到了申诉的门槛。毕竟,劳动权益的保护不能只靠劳动者的“血泪争权”和个人奋战,一个健全的社会虽不能避免悲剧,但一定要给自己补偿的机会。

八、破茧（上） /78

家是蕴藏着温暖的地方,在打工妹心中,家已渐渐成为一个概念。她们走向远方,有人不愿回家,有人无家可归,有人终生离家,却还是为了经营那个最终要回的家。

九、破茧（下） /88

打工妹憧憬离开家后变成蝴蝶展翅飞翔,却在异乡体味着破茧成蝶后的心酸。新一代发展态度和价值观体系的变化,带来的不仅是个人家庭人际关系的改变,也带来整个农村社区的变化。

十、禁地 /99

这是关于爱与被爱、需要与被需要的故事。打工妹无处安放的情感让她们面对爱情时既犹豫又欣喜,用她们在爱情里的悲欢离合诠释着这个群体的爱情观。

十一、挣扎（上） /109

当鸟儿的羽翼开始丰满的时候,它总是渴望展翅翱翔。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在充满机遇的城市里,很多打工妹都在等待。经历过奋斗和挫折,她们中的一些人获得了成功。

十二、挣扎（中） /119

卑微的我们，总是要和命运对抗，越是卑微，越要对抗。面对现实的坎坷，每个人都面临着个人境遇的选择。在家乡与城市的来回奔波中，打工妹书写着奋力抗争、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

十三、挣扎（下） /129

初来城市、涉世未深的打工妹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有限，城市里无所不在的骗局与诱惑随时张着贪婪的嘴，将她们吸入底层和“边缘化”的深渊。

十四、逃亡（上） /139

当本应温馨、幸福、安全的婚姻生活变得充满暴力和危险时，打工妹们该默默忍受还是转身离开？而逃亡是面对危险时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

十五、逃亡（下） /150

婚姻像人生的十字路口，谁也不知道哪条路会通向最终的幸福。在这个路口，打工妹有着不同的选择和不同的未来。

十六、创可贴 /162

在户籍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力之下，打工妹群体比一般人群更容易受到伤害。当她们的身体、心理或者其他一些权益受到伤害的时候，什么才是她们的创可贴？

十七、超越 /173

人不是只为自己活着的。平凡而善良的打工妹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帮助别人。她们超越了自我，实现着大爱。

十八、根 /183

是出走，还是回归？打工妹在城市与农村的边缘徘徊，进退两难。但和每一个中国人一样，家乡终究是她们的根。

十九、血脉 /196

打工妹的孩子们,无论是留守在家乡,还是跟随父母在城市中辗转迁徙,生活中都有着很多问题和无奈。如何为他们营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应该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二十、成长 /209

一座城市的诞生和一个乡村的兴起牵连的是一个国家发展观的进化、一种城乡接轨的发展模式的成熟。30年的巨变,打工妹贡献无数,每一个打工妹的故事都在声声诉说着祖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小鸟

18年前,一辆大巴在乡间公路上行驶而去,目的地是一个叫深圳的地方。车上有位乘客名叫余小琼,她是不顾家人的反对离开四川老家的,走的时候,只留下了一句话:现在,也该我们女人出去走走了。

18年后,一辆高速列车飞驰而来,车上坐着的人是余小琼的女儿陈艺,目的地也是深圳,只不过,这里已骤然变成了一座拥有1300万人口的时尚都市,数百万年轻的打工妹继续蜂拥而至,青春和梦想在此纠集。

“纠集”的说法可能有所不当,问题的本身往往才是最好的答案。当余小琼亲自把女儿安排进了自己做工的工厂时,她满意的心情竟然与当年她到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在采访中,我遇到很多像余小琼这样的母亲,在自己可能要离开的时候,就把女儿带进了工厂——打工妹的身份似乎正被代代相传。

凯达姐妹:第一代打工妹的风采

“背井离乡”这个词原本有一种感伤的味道,但如今这种味道已渐渐消失,我们越来越像一株盆栽,为了完成某种功能、构成某种景观,可以随处迁移。早在30年前,她们就已经开始习惯这种迁移了。

2007年的某一天,在位于深圳的凯达玩具厂里,凯达姐妹们又聚会了,每隔几年,她们都会聚一次。而这一次,距离她们来到凯达已经有25年光景了。

25年前,她们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首次相聚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

外商独资企业凯达玩具厂,幸运地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打工妹;25年后,她们又回到了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回到了她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



2007年深圳凯达玩具厂25周年女工聚会

1979年7月,随着蛇口填海造港的第一声炮响,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蛇口正式拉开了帷幕。随后,港商独资企业凯达玩具厂正式进驻蛇口,并在当地招收女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打工妹,当年名噪一时的凯达姐妹随之从四面八方会聚而来。

深圳凯达玩具厂第一批打工妹,郑艳萍就是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可以说,她是被不确定的

未来里朦胧的希望牵引着到这里来的:“当时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不知道它有什么,但是我知道它是一个全新的天地,我觉得可能会有期待,所以我就来了。”

郑艳萍来自广东韶关,1981年,对她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她参加了高考。在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大学是年轻人最向往的地方。然而,郑艳萍落榜了,她成了待业青年。以前路不多,高考是其中一条,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现在的路倒是多了,桥都成了八爪鱼,人却一上去,就绕不出来了。就在郑艳萍苦心准备来年再考的时候,一张韶关劳动局张贴的招工海报出现了:港资深圳凯达玩具厂招收女工,每月最低工资80元。那一年的全国城镇平均工资是60元,白菜价格是一斤5分钱。中学毕业就能拿到80元的工资,确实吸引力十足。

关于郑艳萍进凯达的这段历史,广东韶关劳动局原副局长胡维湘回忆道:“当时很多人都愿意去,因为郑艳萍跟我是亲戚关系,她也说想去,问我怎么样,我说如果你真想去的话我就去跟那个老板讲一讲。”

韶关是一个工业城市,当地国有企业一般不大招收女工,因此待业女青年人数极多,尤其是十七八岁的年轻女孩。那时候,她们正值十七八岁、青春年华,除了琼瑶阿姨在水一方的幻想,生活的选择其实并不太多。

郑艳萍回忆当年自己的心情,是充满了激情和渴望。当时人还没有离

开,心却像飞出了很远似的:“当时就是一门心思想离开,想自己找一片天地,很叛逆地说,那会儿都跟想离家出走似的,对爸爸妈妈说,‘如果你们不让我去,我就离家出走!’”

以前有一种叫“战痘”的药,是用来消除青春痘的,名字起得挺好,但后来效果一般,也就停产了。谁也阻止不了青春痘从年轻人的脸上不停地冒出来,谁也无法阻挡青春的热情。我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的味道,空气里充满着萌动的清新和最本能的冲动。因为,人们已经被压抑了很久。

在此之前,三中全会召开了,“深圳开放”定调了,1979年,有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并且说:离香港最近的深圳要先走一步。在郑艳萍感慨80元的工资很多的时候,来投资的外商们也睁大了惊喜的眼睛。对于他们而言,经济改革的试验田里有的是廉价的劳力和土地,他们很快就赶来了——5年间,200家外商投资的企业就在深圳建起来,也就在同一时间,20多万打工妹也赶来了。

关于第一代打工妹的出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就是这样认为的:“第一代打工妹,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催生出来的,我们之所以称它‘第一代’,意思是在那个时候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被打破了。”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丁娟这样回忆当时打工妹的组成:“那时候出来工作的主要是一些未婚的女青年,她们的学历还算比较高,基本上都在初中以上。”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李小云认为:“打工妹一定是有这样的需要,希望通过这种流动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改革开放初期的打工妹被现在的人称为“第一代”,虽然她们在当时已经是最“市场”的一批人了,但多多少少还是带点计划经济的味道,比如在用工制度上,周孝正举例说:“第一代应该说是在组织,即当地政府和用工单位的引导下,一批一批地进入工作地的,比如珠三角地区的工人。”

1982年春节过后,韶关的100多个姑娘怀着历险的心情出发了。郑艳萍对当时人们在火车站送亲人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当时有几百人在相送,基本上是家里能来的、朋友中能到的都挤在那个火车站上,那里变得人山人海。”

佟静原是韶关水轮机厂的子弟,在凯达与韶关劳动局联系后,她是水轮机长招收的十多名子弟中的一员。一想起当年离开家乡时的情景,她心里就颇不平静:“当时我父亲心里面很酸的,很像每一个父亲嫁女儿的那种



1982年春节后韶关火车站送人的场景

感觉。”

与此同时，梅州、汕头的数百名姑娘也上路了。她们忍受颠簸，一路吐着，带着惊慌和期待的心情，投奔那个传说中的地方——深圳。

现在，郑艳萍回想起那一路的感受，感觉自己真是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我就觉得从深圳到蛇口的那条路怎么那么远呢，而且还是尘土飞扬的，进了蛇口就更不用说了，就像进入了一个大工地。”和郑艳萍同期进入凯达的李惠莲也是一样：“我们第一天进公司，就在简陋的工作台上面睡了一个晚上，晚上连洗澡的地方也没有。”

这个地方本来叫安宝县，1979年被命名为深圳市，第一批凯达妹们到达的时候，她们马上就发现，这里其实离香港很远，她们是来拓荒的。刚到深圳的打工妹们第一天就有很多不满的想法，第三天就走了一部分人，可李惠莲却决心要等半年，“我想就当把自己下放到农村里了，我就想在这里等待，在这里期盼，在这等着再看看未来。”有的人走了，但更多的人选择了留下，工厂、工资、未来，像一个巨大的洞口把她们牢牢地吸了进去。

一个老板这样评价第一批打工妹：工人劳动积极、主动，勤学、苦练，能吃苦，又听话，负责任。她们并不因为为资本家打工就消极，她们同厂方合作得很好。在这里，老板不仅找到了全世界几乎最便宜的工人，而且找到了全世界品质最好的工人。

在佟静的记忆中，她们“每天就是这么周而复始地干活，干起活来就有

一种你追我赶的感觉”，郑艳萍更是回忆道：“应该早上8点钟上班，我们却以为越早打卡越好，结果就老早地跑去打卡。”

那个年代有个词叫“主人翁意识”，工人是令人自豪的职业，工厂就是我的家，工厂的财产我们要舍身保护。老板不大懂那种自豪感，他还以为这些打工妹出来干活就是为了钱。

1981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了世界杯冠军，与如今那些“荣辱不惊”的比赛相比，当时可是举国欢腾，这也不可避免地激发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热情。继毛泽东时代的男女平等之后，第二次，妇女在职业、尊严感上都得到了群体的自我满足。

自豪感不是一种美德，但很多美德却因自豪感而生。郑艳萍有种自豪感到现在还依然旺盛，只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反而很少有了：“我们当时的人其实真的比现在的人快乐，也有优越感，现在的人反而很迷茫。那个时候我们和父母那一辈有个巨大的反差，我们来这里挣的钱比父母挣了几十年的钱还多。”

郑艳萍的这句话让很多人都吃了一惊，真相常会与人想象的不同，就像最近我才知道，正宗的咖啡馆不让吸烟的原因并非是出于公德，而是因为烟味会破坏咖啡原本的香味。大概是由于不同的立场和境遇吧，一个外人永远不会完全理解里面的人所面对的一切……

说起来，当年打工妹的生活和现在的大学生有几分相似，虽然每天做的事情不一样，但那种单纯的快乐却是近似的。郑艳萍回忆道：“大家常把自己带来的零食凑在一起，或者一帮小女孩在宿舍里面唱

唱歌什么的。我们还是会用一些方式来让自己的生活多姿多彩一点的。”

和所有的凯达妹一样，翁纯贤当年也是个“爱臭美”的丫头：“每一个凯达妹都会打扮得很时髦，比如那个时候我还敢穿短裤。在那个年代女孩子一般是不穿短裤的，最多只是穿裙子，而我却可以穿一个很时髦的短裤，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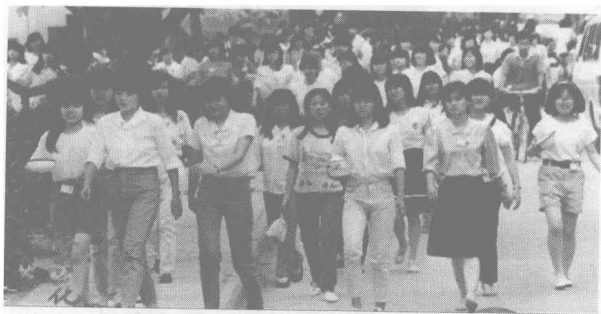
翁纯贤斜绑着头发、穿着时髦的短裤

后再把头发绑一个任意的造型,以前最多就是正正地绑个马尾,那时我会把它斜着绑在头上,或者把头发搞得很夸张,而且自己爱怎么搞就怎么搞,也不会有人说你。”

与依然守在农村的女孩们相比,凯达妹们生活的惬意还不止这些,郑艳萍说:“还有一件让我们觉得挺自豪的事情是,这里有很多走私的物品,比如邓丽君的录音带、太空棉的棉褛之类的。深圳火车站对面有一个很大的公共厕所,那些水客把对岸的牛仔衣、牛仔裤一下子穿两三件在身上,拿过来就在厕所里卖掉,周末的时候我们就买这些东西。工作了一年以后我就买了一个彩电回家,我记得当时买的是乐声牌的。”

致富的结果是令人兴奋的,当富裕感支配郑艳萍们的那一刻到来的时候,所有的选择和付出似乎再也不用计较。

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上,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标语,这种自由舒展的气氛鼓励大家投身于那一年的一个新名词中——市场经济。凯达妹早就先行一步了,时光在流水线和歌声中流逝。一年之后,就有第一代凯达妹离开了;当然,也有人一直工作到1995年,甚至跟随凯达厂迁移到东莞;更多的人,在这里工作五六年,耗尽青春之后方才离开。



20世纪90年代初媒体曝光率最高的一张关于打工妹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就是当年凯达姐妹的风采

深圳晚报摄影记者江式高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了深圳30年的风云变化,这张照片就出自他之手,他对当年那些瞬间的记忆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个时候蛇口的打工妹在特区里边已经经过一些技术培训和文化学习了,精神风貌也有一些变化,我看她们穿得也很好,精神也很好。”

对于这一批打工妹的独特之处,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丁娟的感觉是:“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她们已经学到了城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这种求新创新的意识。”对此,周孝正所长给出的评价是:“她们的思想、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情趣,以及支付能力都已经城市化了。”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李小云则

说：“她们更多地接受了相对自由主义的、相对妇女解放的、相对来说男女平等的这些更加接近于现代文明的一些思想。”

“打工婆”王璞玉

秋天,是第二个春天,每一片叶子都变成了一朵花。我们都曾因为革命的号角脸红心跳,我们都曾为同一种东西感到过莫名的畅快。现在我知道了,让我畅快的是记忆中青春的味道。

打工,打工妹,这样的称谓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在我寻访打工妹的过程中,一位71岁还在打工的老太太闯入了我的视线。她叫王璞玉,自称是中国目前年龄最大的,已经老掉了牙的“打工婆”。王璞玉现在为一个香港的老板打工,她是这家服装企业的总经理,被称为是管打工妹的打工妹,她管的打工妹和郑艳萍那样的凯达姐妹完全不同,她们全部来自农村,从农村走进了城市。19年里,王璞玉始终和几百名农村出来的打工妹生活在一起,见证了打工潮滋生、兴起、高潮和退潮。

王璞玉现在是深圳大梅沙某港商独资制衣厂的总经理,她回忆起当年招收这些打工妹,把她们带到厂里来的时候,还费了很大一番力气,而这些,在现在看来可能显得有些荒谬:“我在招工的时候,这些孩子的父母不放心。我招第二批工的时候把她们就安置在阆中县的招待所,有一个女孩的妈妈五点钟就从招待所把她拉了回去。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她们谁是张三谁是李四,她们都说深圳那个地方是红灯区。有的孩子偷偷地跑回去,不回来了,结果我就浪费了13张火车票。”

在十几年前红极一时的电视剧《外来妹》的第一集里,老村长把村里开的出工证明分发给每个即将外出打工的年轻姑娘们时,她们一张张淳朴的脸上都写满了踌躇和局促,和片中的情节一样,当年这些农村女孩离开家乡并不像今天这么从容,她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外在的牵绊。《外来妹》里的哭戏不少,在王璞玉的印象里,她们厂里的女孩们,脸上也常常挂着泪珠:“她们刚来的时候,吃饭也好干别的也好,一天老是哭哭啼啼的。如果一天上午来了信,起码就会有两个人哭。”

1978年推行的包产到户政策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1982年,全国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让我们买豆腐买猪肉再也不需要票,价格还很便宜。新的问题又出现了,1984年,农民面临着卖粮难的窘境,农村中出现